



生活 特写

殖民时期私邸变公共建筑 花卉草木文献展颜色

订户

来自 / 联合早报

文 / 董向京 摄影 / 何家俊

发布 / 2021年5月30日 5:00 AM



分享

两幢殖民时期老洋房，在新加坡植物园格洛扩展区相望百年。褪去作为大使馆与大使官邸的繁华，成为热带雨林探秘馆和本区域植物文献古籍艺廊。用线条与色彩描绘的花木，以艳丽的姿态让人们重识本地久远的自然生态。（何家俊摄）

字体大小: 小 中 大

占地8公顷的新加坡植物园格洛扩展区（Gallop Extension），两幢殖民时期的老洋房，5号的“雅柏拉”（Atbara）与7号的“英华哲瑞”（Inverturret），隔着相思树与大草坡，对望百年。它们的建设，离不开十八九世纪英国园林景观历史。从私邸变身公共建筑，“雅柏拉”成为华侨银行树木园内森林探秘馆，推动热带雨林生态研究；“英华哲瑞”则是本地首个永久性展出植物艺术品的艺廊。



洋房的混合体殖民时期建筑特色，显示在地性的多元文化融合。它们无言的大美，处处展现在设计细节上。随着建筑师走进去了解它们的前世今生。

1881年的新加坡地图上没有格洛路（ Gallop Rd ），此处也没有任何建筑物。1924年的地图上，建于1898年的“雅柏拉”（ Atbara House , 5号洋房）与建于1906年的“英华哲瑞”（ Inverturret House , 7号洋房）已经出现。

两幢洋房设计出自英国大师级建筑师约翰·毕威尔（ Regent Alfred John Bidwell , 1869 - 1918 ）之手。他在本地的杰作包括：莱佛士酒店、良木园酒店、维多利亚音乐厅。毕威尔在1895年加入新加坡最古老的建筑师事务所Swan & MacLaren , 负责重量级设计项目。

“雅柏拉”以非洲东北部的一条河流得名，1898年4月8日，大英帝国在该区与1万5000多名苏丹人的战斗中取得了胜利；“英华哲瑞”则让人想起苏格兰高地的河流。

“雅柏拉”占地622平方米，建筑面积为1111平方米，主人是英国大律师约翰·伯金肖（ John Burkinshaw ），他于1874年创办“艾特肯，唐纳森和伯金肖”律师事务所，是新加坡历史最悠久的律师事务所，现名为“唐纳森与伯金肖”（ Donaldson & Burkinshaw ）。1903年，“雅柏拉”与周围土地卖给海峡商行最早会长之一查尔斯·麦克阿瑟（ Charles MacArthur ），他后来出资建了占地670平方米，建筑面积1270平方米的“英华哲瑞”。

双洋房多次易手，在此居住过的包括大英帝国空军总司令。1923年被海峡商行买下，从1939年至1999年租给法国驻新大使馆当使馆与大使官邸。我国政府在1990年买下这两幢洋房，继续租给法国大使馆至1999年，过后空置。

国家公园局于2015年接管双洋房，陈家毅建筑师事务所标到工程，负责将之整修改造成公共建筑，自今年3月中旬起对外开放。“雅柏拉”成为华侨银行树木园内森林探秘馆，结合视听觉等元素的展览，教育公众认识本地树林生态，推动热带雨林生态研究；“英华哲瑞”则化身为本地首个永久性展出植物艺术品的艺廊，展示近400年前至今附插图的植物学古版书籍、水彩与素描植物绘图。



丹麦植物学家纳萨尼尔·瓦立池的《亚洲珍稀植物III》（ 1832 ）画页。（ 新加坡植物园提供 ）

以轴线衔接两幢房子

本地知名建筑师陈家毅（64岁）带领七八位建筑师团队，早在2015年对双洋房展开文献档案的搜寻研究。对他来说，这是个极其难得的项目，他在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语带热情。他犹记得1994年到古鲁尼路（Cluny Rd）2号设计房子，第一次看到这两幢老房子，非常惊艳。约2000年，他再到古鲁尼路8号设计房子时，与它们重逢，更好奇它们的分享 曾偷跑上去探看，发现空置许久的建筑残破不堪。



陈家毅建筑师事务所创办人陈家毅（左起）、建筑师梁伊恬及李维洋等参与两幢洋房的整修工程。（何家俊摄）

重新规划后的植物园格洛展区的蓝图，是以双洋房为核心展开。展区有三个入口处，我们跟随建筑师团队，从位于泰瑟道（Tyersall Ave）的访客中心进入，走道为尚未开发的荒野热带雨林包围，葱葱郁郁，拐个弯，山坡上的5号洋房雅柏拉出现在眼前。



zao**bao**^{sg}

早 晚 全 新



分享

从5号洋房窗户望向7号洋房，把窗口当画框，与窗外景色连接，是16至18世纪流行的建筑形式。（何家俊摄）

双洋房的舞台背景是茂密的热带雨林，高耸树木是远景，陈家毅强调，规划时不破坏周遭景观。双洋房继承18世纪英国园林景观设计，类似中国园林，以人为本。访客的视角跟随园林建筑布局，土地高低起伏，景观跟随变化，走到山坡上，会发现另一幢房子、小亭子等，团队利用轴线设计衔接两幢房子与其他建筑。

陈家毅说，这些建筑巧妙地摆在某个适当的位置，不会直通到底。园林设计是宽敞的，有山坡、水景，蜿蜒曲折的走道，团队还有一组景观设计师讨论园林的布局。英国建筑师约翰·范布鲁（John Vanbrugh）与尼克斯·霍克斯穆尔（Nicholas Hawksmoor）就是以不对称的轴线设计园林。

“双房子百多年来都是对望的，我们保留了相隔房子的大草坡与三棵相思树。怎样规划得与现场的自然环境配合，很考功夫。越是亮眼的，越是破坏了人与自然的整体关系。”陈家毅说，团队本想在走道上加建有盖走廊，但因太碍眼而放弃。

新增添的房子（如餐馆、访客中心）和设备（如咖啡座、停车场），或活动区（如儿童玩乐设施）都尽量放在双房的外延位置，减少干预。访客中心建筑设计灵感来自5号洋房，保留原有高达25米的榕树。从世界各地搜寻龙脑香等植物品种的树木园，香草花卉的疗愈森林等，参差散布在园林格局中。

非黑白屋而是混合体

陈家毅指出，从英国派来的建筑师如毕威尔，把他们的英国经验带入新加坡殖民地建筑设计中。

1830年至1869年流行仿古典式的英国建筑模式，渐渐发展成两大一小的布局。来到热带以后，建筑屋顶增添了通风遮阳排雨水的功能，借鉴了印度庄园式房子的经验。1870年至1899年，建筑师大玩多元主义（eclecticism），就是集合多个外来因素（如都铎、歌德式）的混合体建筑。建于1898年的5号洋房雅柏拉就是混合体建筑，而不是一般人所认为的黑白洋房。陈家毅说，已故建筑师李急麟撰写的建筑书很早就指出它不算是黑白屋。



建于1898年的5号洋房“雅柏拉”是混合体殖民地时期建筑，而不是一般人所认为的黑白洋房。（何家俊摄）

5号洋房有什么建筑特点？

5号洋房的L形布局在当时是很特别的，将后花园融入布局里，成为屋子的一部分。陈家毅认为，这是毕威尔受工艺美术运动影响，尤其是开启思潮的设计师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1860年在英国伦敦郊区建盖的“红屋”（Red House）。“红屋出现后，石破天惊，波希米亚的诗人、画家、建筑师等聚集鬼混，相信毕威尔向往这种生活方式。”他说。当时毕威尔仅29岁，不受建筑条例的拘束，考虑到5号洋房地形与后面的热带雨林，将房子正90度取角改为130度。

洋房建筑分上下层，上层仿都铎式，由半木与刷漆的砖墙结合，是庄园式建筑特色；下层则是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浮脚楼，拱门采歌德式与摩尔式风格，包括五叶形（cinquefoil）设计。陈家毅说，这些拱门成为画框（房子的玻璃窗也一样），我们看得到阳光与绿地，周围的大自然，这也是一种轴线设计，在暗处望向光明。



zao**bao**^{sg}

早 晚 全 新



从“雅柏拉”的五叶瓣拱门可赏户外绿荫。（何家俊摄）

毕威尔1898年的蓝图显示最早有28个拱门，后增两个，大使馆租用期间封掉一些，仅剩18个，走在拱门下会遇到很多“死角”。团队利用蓝图3D模型，恢复了29个拱门，尽量做到访客不用频频弯腰穿过。由洋葱状蝴蝶结点缀的楼梯柱后来才出现。



分享

“雅柏拉”的拱门采歌德式与摩尔式风格，大使馆租用时有些被封，团队加以还原。（何家俊摄）

当时多数住宅前面具备庄园式建筑的通风走廊，但是，5号洋房和红屋都没有走廊，前者在房子后面设计了服务通道。为了改装成公共建筑，团队加固了楼上地板结构，得以承受更多重量。楼下原有五个浴室，直通楼上卧室，空间的布局相等于现代套房的安排。英国人追随文化复兴格式，贵族活动的住宅设在二楼。团队将其中三个房间打通成展厅，以现代厕所、办公室等取代。天花板像灯笼一样，具排热作用的天窗，一进门就将视线往上望。

5号洋房以黑白档案照与文献，展示了雅柏拉化身华侨银行树木园森林探秘馆的过程。它今世最重要的使命是让我们更了解自然生态的多样性，本地土生植物品种多达2406。展厅也展示动物、植物、鸟类等知识，听得到不同的鸟鸣。建筑团队考虑过融入树的模型，最后用现代剪贴方式呈现，以吸引年轻人和儿童对自然生态产生兴趣。



从5号洋房望向原用来停放马车的门廊，由中世纪特色的弧形木材和吊坠打造。（何家俊摄）



“雅柏拉”今为华侨银行树木园森林探秘馆，保留像灯笼一样，具排热作用的天窗。

7号洋房展古典建筑风格



1906年建成的7号洋房“英华哲瑞”结合庄园式与帕拉第奥的建筑风格。（何家俊摄）

1906年建成的7号洋房“英华哲瑞”也不属于黑白洋房，而是结合庄园式与帕拉第奥（Palladio）建筑风格。庄园式特色体现在茅草形屋顶与通风走廊，采用维多利亚砖建造，凸出墙外的木制窗显示这不是黑白屋结构。

帕拉第奥源于意大利威尼斯建筑师安德烈·帕拉第奥（1508-1580）设计的欧式建筑风格，建立在古希腊罗马的正式古典寺庙建筑的对称性、视角和价值观上，17世纪中期在英国很受欢迎，发展到18世纪末。陈家毅说，毕威尔虽受帕拉第奥对称的影响，但不甘寂寞，在平面图上将设计转成45度角，而非传统的直角，形成仆人通道，让享受仆人服务的英国上流社会主人见不到仆人。在整修后，这45度角是电梯所在。



分享 飞威尔的设计精神

在伦敦和伊斯坦布尔都设有事务所的陈家毅指出，毕威尔设计7号洋房时考虑到与5号的互望关系，在7号洋房一转身就能看到5号洋房或周围的树荫，将窗户当成画框，是16至18世纪流行的建筑形式。团队在整修时尽量还原毕威尔的设计精神，让双洋房继续对话。5号洋房当代有趣，7号洋房回到古典建筑风格，但中间有个转折，显示了毕威尔的创造精神。

7号洋房有一间三面透光的阳光房，是屋内光线最为柔和之处，现在是儿童活动室，也是园林景观设计的一部分。建筑尚保留原有的不透明手工玻璃窗，木制楼梯，状况完好的意大利大理石地板。

从7号洋房走道可通往新添置的餐馆。陈家毅说，餐馆建筑也用7号洋房的45度轴线设计，南北朝向，同样的房顶，但不能与双洋房平起平坐，处于较低地势，咖啡座位置亦然。餐馆屋顶采用花卉造型，与5号洋房花瓣拱门对望。餐馆采用360度透明玻璃墙面，视野开阔，俯瞰周围的树林以及蜿蜒曲折的走道。

无论走到哪里，都置身在大自然的怀抱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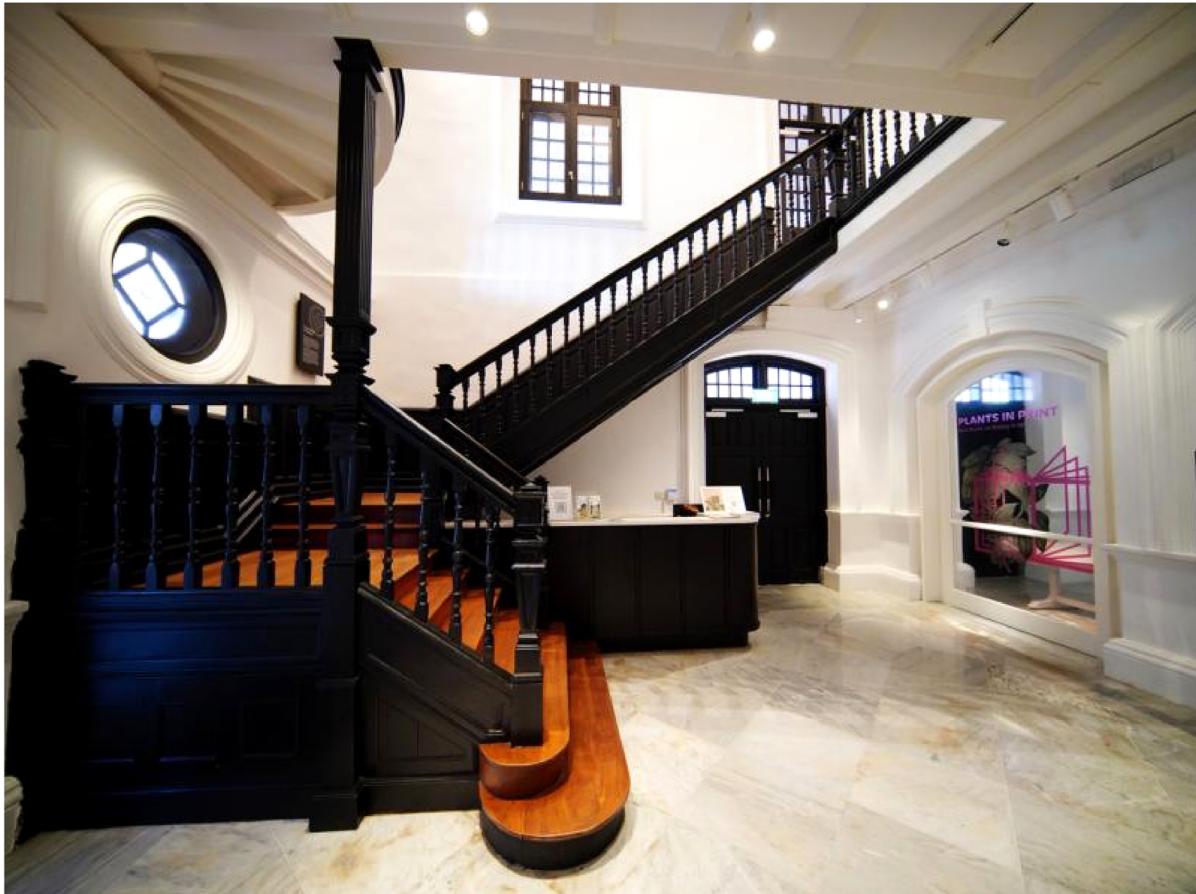


“英华哲瑞”三面透光的阳光房，现在是儿童活动室。（何家俊摄）



zao bao^{sg}

早 晚 全 新



“英华哲瑞”保留原有的不透明手工玻璃窗，木制楼梯及状况完好的意大利大理石地板。（何家俊摄）



新添的餐馆建在地势较低的地方。餐馆建筑采用7号洋房“英华哲瑞”45度轴线及类似房顶。（何家俊摄）



从画作与文献看植物园历史

新加坡植物园是植物研究的区域中心，多年来珍藏超过2000件与植物相关的画作，以及超过3万本书籍（包括不少古版书）。7号洋房“英华哲瑞”是本地第一个永久性展出植物艺术品的画廊，通过艺术绘图，让我们拥抱植物花卉构成的奇妙自然界，也翻开殖民地植物园历史的篇章。

自16世纪始，欧洲势力在亚洲建立殖民地，帝国企业热衷于追逐香料（如胡椒、豆蔻、丁香），以及源自植物的产品（比如茶、鸦片）。殖民者展开科学的研究，从中发掘具经济潜能与效益的植物。欧洲植物学家开始通过详细的插图书籍与绘图，收藏并记录亚洲的植物。新加坡植物园收录的稀有书籍，展示了早年殖民地植物园在南亚和东南亚的发展。

分享

美国，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蒂莫西·P·巴纳德（Timothy P. Barnard）在《大自然的殖民地——新加坡植物园史话》（Nature's Colony）一书点出，现代植物园伴随权力花园同期出现。随着商业贸易的发展逐渐以自然界为基础，植物成为前工业时期全球经济关键的贸易品，植物园成为早期现代社会与帝国发展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植物学成为殖民地扩张最重要的工具，掌握植物知识成为权力的基础，而把这种知识转化为对遥远殖民地土地与经济的控制，就是在植物园中发生的。

未曾展出的文献档案

六年前从意大利都灵移居新加坡的植物学家米歇尔·罗达（Michele Rodda）博士是植物艺术画廊展览策展人。他受访时说，这些与植物相关的文献档案几乎从没展过，或没以这样的规模展过。展厅每隔半年轮流更换展品。

罗达透露，植物园珍藏的最古老植物书籍出版于约1500年，但该小书没插图，就没展出。这次展出附插图的最古老书籍出版于近400年前，德国植物学家格奥尔格·艾伯赫·郎弗安斯（Georg Eberhard Rumphius）的《安汶岛植物》（Herbarium Amboinense）。当时他受雇于荷兰东印度公司，收集在印度尼西亚东部发现的各种植物的用途，作为药用或建筑、纺织等素材，绘图记录。这类古书大多以拉丁和荷兰文撰写，大尺寸的版本属于奢华级别，黑白印刷的插图风格大不同，手绘上色。

莱佛士爵士曾驻扎印度加尔各答，经过槟城，携带这些地方的植物书籍与绘图到新加坡。新加坡植物园收藏中，有超过400件绘图来自槟城植物园。以莱佛士命名的猪笼草等绘图书本展出。植物园珍藏以万计的植物标本也展示一小部分。

分享

画廊还邀请以新加坡为基地的印度裔当代艺术家舒比琪·劳（Shubigi Rao）和张玮欣创作。舒比琪·劳的《通过征服，收藏和纲要来阅读自然史》是结合素描、照片与文本的卷宗，植物园古书插图交织艺术家拍摄的污染地照片，探索植物学、书本和知识之间的关系。植物艺术画廊在国家艺术理事会支持下，将在下半年开展社区艺术入驻计划。



早期精彩的植物绘图

二楼展厅主要展示植物素描与水彩绘画。入口处有一张水彩画，由植物园第一任科学主任、英国植物学家亨利·尼古拉斯·里德利（Henry Nicholas Ridley）聘请的第一位植物插画师詹姆斯·德阿尔维斯（James de Alwis）作于1891年，描绘本土品种的猩红椰子或俗称的口红棕榈（*Cyrtostachys renda blume*）。植物园后来用猩红椰子作为商标图案。

植物园珍藏最早的有记载绘图是詹姆斯在1890年所作的鹤顶兰花（*Phaius tankervilleae*）。詹姆斯和查尔斯·德阿尔维斯（Charles de Alwis）兄弟俩受聘于植物园，联手绘图了几百件作品，记录了从未被描绘的植物。植物园从1942至1945年期间聘请植物插画师创作，最后一个插画师是朱拉米·本·萨姆苏里（Juraimi bin Samsuri），他画了400张素描与水彩绘图。

此外，亨利·尼古拉斯·里德利、1900年代中期旅新的英国植物画家芭芭拉·埃弗拉德（Barbara Everard）和让·金洛奇·史密斯（Jean Kinloch Smith）也留下精彩的植物绘图。罗达指出，不是所有植物插画师都出身植物学。早年植物插画师的绘图用色很关键，对辨识各种植物（如菌类）起关键作用，这是早期黑白摄影无法做到的。当代画家如Waiwai Hove、Anna Lu等所作的植物绘图作品也展出。

此外，也展出约百件与植物相关的水彩绘图或炭笔素描，范围广泛，有新加坡榴莲、红毛丹、野生芒果、天堂鸟等。一些始自1930年代的杂交品种胡姬花品种绘图，显示植物园在20世纪已发展成胡姬花研究中心。

在绘图中，我们发现有一些本土品种已消失，有些尚存，显示这块土地植物的多样性。罗达笑说，本以为已消失的品种最近重新被发现，至少两件绘图必须拿掉。

展厅也用实物展示日据时期植物绘图的出版过程，并通过动画录像，走入植物插画师的世界，看他们如何收集标本与绘图的过程。

走出展厅，记得留意矗立在草地的英国雕塑家安东尼·葛姆雷（Antony Gormley）的多面体雕塑。



古书上优美的植物插图是印刷后手工上色，把参观者带入奇妙的自然界。（何家俊摄）



华文现代文学重要据点

5号与7号洋房前生最为人知的身份是前法国大使馆与大使官邸（1939至1999）。诗人、前报人潘正镭在2006年的访谈录《陈瑞献的法国接触》点出，法国大使馆在上世纪60年代末至80年代期间，在新加坡艺术界尤其华文现代文学的发展上扮演重要角色，具有非凡的文化象征意义。

著名前报人、主笔李星可（1914-1996）曾在法国大使馆兼职作翻译。李星可生长于北京，自小在法国天主教办的学校受教育，留学比利时与法国，日后他不管住哪里，始终保持和天主教社团及法国人机构的来往。他在1950年移居新加坡，任《益世报》总编辑，协助法新社在本地创办其东南亚总分社，后入《星洲日报》《南洋商报》当社论主笔。他在1991年出版《乱世沧桑：一位传奇人物八十自述》（1991）。

多元艺术家陈瑞献（78岁）曾在法国大使馆任新闻秘书长达25年（1968-1993），大使馆周边古木参天，广袤草地，成为他创作的灵感。陈瑞献以巍巍大树为蓝本，画了彩墨画《大中直正》，在1996年由当时吴作栋总理代表内阁赠给新加坡报业控股执行主席林金山作为贺礼。

陈瑞献于1981年4月16日作诗《一个诗人的房间》，描述了他的办公室与周遭环境：

文件堆里一群壁虎在寻食/鸡栖于背窗口/跟八只八哥叙旧/书架上一盘眼镜蛇在午睡/左邻的园丁/跟右舍的车夫都过来午睡/打字机上挂着一只野猫在午睡/门楣是一排铝质番石榴树叶/门檐垂下永恒的水帘/白眼圈在叶间造窝/一张断发织成的坐席/墙壁画满了悉达多/一个诗人的办公室。

陈瑞献曾言婉谢报界工作邀约，因为“觉得这座在大花园中的山庄别墅，比较适合一个诗人的作息。留学法国驻新加坡大使馆而不是留学法国，或者说是另一种留法的方式，大使馆是我的课堂”。

陈瑞献1985年与法国华裔大画家赵无极的相会，2004年与高龄82的法国新小说之父何布 - 格力叶（Alain Robbe-Grillet）的晚宴都在大使官邸。

大使馆也出版重要的现代文学书籍，1970年出版当代大诗人雅克·卜列维（Jacques Prevert）作品的中译本《雅克·卜列维诗选》（陈瑞献和史孚合译），还有陈瑞献与安敦礼合译的中文版《法国现代文学选集》。